

西果园里智擒汉奸

西果园是原先位于汾水水库淹没区的旧娄烦镇一处专种水果蔬菜的园圃,后来演化成村名。抗战时期,西果园村处在我八路军根据地和敌占区交界地带,对敌斗争形势十分复杂。1942年农历七月,日寇占领娄烦镇后(指汾水水库淹没区的旧娄烦镇,下同),对方圆十里村庄实行治安强化,先后建立维持会、伪政权,逼迫村民给日寇送粮、送款、送民夫、送柴炭等,西果园村更是日寇骚扰的重灾区。在这种情况下,西果园及附近村庄的民兵联防队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在敌占区广泛开展反维持斗争。在伪军警备队里,有郝姓、杨姓两个汉奸经常领着日军到处搜捕屠杀八路军伤员、我方村干部及家属,勒索平民,欺男霸女,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武工队了解情况后,制订了周密的锄奸行动计划,决定为民除害。1943年农历二月初二,一大清早,郝、杨两汉奸大摇大摆从娄烦镇走官道来到西果园,没想到已经钻进了武工队的口袋。武工队和民兵联防战斗队在八路军358旅7团6连的许柏林、武进邦等人带领下,黎明前就在村东西两头官道南面的坪地设了暗哨,并在堡子崖设了指挥岗,统一指挥村东西两头的秘密行动。在樊吟庙东附近,二汉奸分手。郝姓汉奸往西去村民张某家,杨姓汉奸就近朝村民李某家走去。他俩根本没留意,村东头下坪田里有一位刨茬子的老叫花子——武工队员许柏林。郝杨两人一分手,许柏林就摺下簸头,抄着离杨不远的另一条小路尾随而去。杨姓汉奸进了村民李某家窑洞,把手中的家伙顺手立在门后,摘下毡帽,蹲坐在离锅灶很近的炕头正端碗喝水,就听见门口有乞丐讨饭声。转眼间,那乞丐已挡在眼前,拔出手枪顶住了杨姓汉奸面门。随后跟进来两个民兵,冲上去揪着杨姓汉奸朝官道就走。此时,村西头的“脑脑沟”里刚刚发生一场由武工队员武进邦等人策划的“打架纠纷”。还没到张某家,郝姓汉奸就看见有人在张某家大门前的路上打架。郝姓汉奸见不给他让路,就吆五喝六,吹胡子瞪眼。突然间,从旁边院子冲出几个劝架的,不容分说把郝姓汉奸抓上就走。维持会的“村长”与三位“闾长”(相当于村民小组长)正在村东头景继续开会商讨事后如何对付鬼子,忽然听见堡子崖一声枪响,知道八路军得手了。原来,设在堡子崖的岗哨探明两个汉奸都已抓获,就及时发出统一返程信号。料定鬼子要来算账,“伪村长”立即假装去娄烦镇的“红部”(日本宪兵司令部俗称)向日寇报信,说他在从镇上返回西果园村的途中听见枪声就火速折回报告,果然成功瞒过了敌人。三位“闾长”随武工队押着两汉奸直奔娄家庄村。接近娄家庄时,杨姓汉奸伺机逃跑,沿涧河河槽向东猛窜,武工队员边走边喊,刚从地里回来的农民李定海、李马脸听见喊声,举起农具迎面拦截。杨姓汉奸一怔,左顾右盼间,被赶来的武工队再次抓获。后来,杨姓汉奸被押送到天池店韩家沟村,郝姓汉奸在娄家庄村被当场处决。罪恶累累的汉奸得到应有的下场。

王玉英 讲述 景彦钧 整理

“嫁汉要嫁挠羊汉”

王冀成

蹴礼绘

挠羊赛是在忻府区、定襄、原平(下简称忻定原)一带盛行的群众性竞技摔跤活动。“立了秋,挂锄钩,唱戏挠羊放牲口”,夏秋季节,当地人在劳作之余常常以摔跤自娱自乐,胜出者的奖品一般为一只又肥又大的绵羊,“挠”在山西方言里是“扛”的意思,“挠羊”之名由此而来。2008年,挠羊赛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自古美女爱英雄,忻定原一带的姑娘们选女婿时,不看高富帅,而要看对方是不是挠羊汉,当地还有“嫁汉要嫁挠羊汉”的俗语。一旦有人成了挠羊汉,其大名很快就会在十里八乡传扬开来。

劳动之余,夏日饭后,无需专门组织,或地头,或街头,或打谷场,或河边沙滩,兴之所至,便摆开跤场。上场的人不分年龄,不分体重级别,自愿出场,一跤见胜负。参赛者赤裸上身,下身长短各随其便。比赛时只能抓对方麻裤丝做的裤带。裤带一旦断折,比赛就必须停止,重换后才能继续比赛。挠羊赛讲究“过五关斩六将”,连续摔倒5人叫“保羊汉”,6人就是“挠羊汉”了。最后的胜利者会把身披红绸的大绵羊扛起来绕场一周,展示自己的胜利成果。

据说,挠羊习俗起源于宋代。在远古时期有戴牛角相抵的游戏,到西周时期被改称为“角力”,主要被用来训练士兵。秦时将角力改称“角抵”。到唐代,角抵已在民间十分流行。到宋代,角抵又被称为“争交”,亦称“相扑”,民间还有了相扑社团。

相传北宋初年,宋太宗任命杨业为代州刺史,又密嘱潘美对其监督挟制。杨业兵少将寡,又处处受制于潘,夫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训练民兵,战时抗敌。为避免潘美诬陷,他便充分利用了摔跤来训练。

还有一说和岳飞部下程咬金有关。岳飞遇害后,程咬金被遣送回忻州老家。为了增强乡亲们抵御外敌的能力,他将岳飞军中练兵的胶术传授给了乡亲,从此忻定原一带就有了这一民间竞技运动。

从卿大夫到祈雨神

曹嘉成

【窦大夫祠】

窦大夫祠名列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位于太原市西北25公里处的上兰镇,始建年代不详,历史上有烈石神祠、英济侯祠和窦大夫祠三种称谓,是为纪念春秋时期晋国大夫窦犇(字鸣犊)而建的祭祀建筑,也是历代地方守臣及民间百姓的祈雨场所。祠占地面积4428平方米,宋元丰八年(1085)八月二十四,汾水涨溢,窦大夫祠遂易今址,元初重修,明清续修,其中献亭、大殿均为元代遗构。祠外西北部为寒泉遗址,东部为保安寺、观音阁和赵公馆等建筑。

在太原二龙山脚下的窦大夫祠,曾经藏有一处令人称赞的美景:两山相隔之间,一泓清泉从山涧飞泻而出汇入汾河。奔涌的汾水,连同两岸大片的翠绿与绵延不绝的悬崖、怪石一起,共同构成了一幅如巨龙吐水般雄伟壮观的神奇画卷。而更为奇特的是,即使是盛夏时节,将手伸入山泉当中,也有丝丝寒意袭来……

这便是太原市古晋阳八景之一的“烈石寒泉”。相传,这一盛景与窦犇有着密切关系。面对如此美景,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们,自然是少不了一番诗情画意。唐代诗人李频的《游烈石》一诗就曾描述过此情此景:

游访曾经驻马看, 寒犇遗像在林峦。
泉分石洞千条碧, 人在玉壶六月寒。

我们如今所看到的窦大夫祠,是元代至元三年(1266)所重建,后世不断修缮的结果。站在窦大夫祠旁放眼远眺,自然与人文景观的结合,仍能够让游人一窥古人的那份情致。

窦犇,春秋晚期晋国大夫,生前已是颇具名望的贤士。“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所言,在交代了作为晋国“六卿”之一的赵简子与窦犇、舜华二人之间的关系之外,又使得窦犇身故的原因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窦犇、舜华二人既然是赵简子的得力手下,为何赵简子不惜承担谋害贤臣的罪名,也要急于除去二人呢?

晋文公时,军队被划分为上、中、下三军,并各有正、亚二卿统领,大夫则位列卿之下。而到了春秋晚期赵简子时期,原本协助国君的六卿职位成为了世家大族争夺的目标。在彼此之间的厮杀与兼并下,到了晋侯平公元年(前557),晋国事实上已被韩、赵、魏、范、中行、智六卿瓜分。后来,以妄图改立新君的范、中行氏为一方和以韩、赵、魏、智为另一方之间的,时间跨度长达七八年的内乱,最终以内乱,中行寅逃往齐国而告一段落。而春秋末期,赵氏抵御智氏、韩氏、魏氏的晋阳之战,最终形成了三家分晋的历史新局面。

赵简子当时在六卿中实力最为雄厚。相传,窦犇虽是赵简子的手下,但崇尚“礼治”的他,对“虽为晋卿,实专晋权”,乃至意图僭越、取晋王室而代之的赵简子抱有不满。“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国语·晋语九》中,窦犇以范、中行氏最终结局作为两人“变与不变”的回答,既是对范、中行氏从六卿落得背井离乡结局的讽刺,也是对赵简子僭越行为的劝阻。

为了除去成就霸业道路上的“绊脚石”,赵简子命令窦犇必须在一定期限内开渠引泉,来缓解当地严重的旱情,否则将会有严厉的惩罚。尽管窦犇带人日夜开凿,却仍无法在规定期限内完工。为了不连累别人,自知难逃罪责的窦犇拔剑自刎而死。传说中,这位贤大夫的高品质感动了山神。在山神的神力下,泉水从山中自行流出,让百姓们得以安居乐业。

“鸟兽对于不仁义的行为尚且知道要避免,更何况是我呢?”本有着投奔赵简子想法的孔子,在发出如此感慨之后,毅然调转头车离开。1959年郭沫若先生的《访窦大夫祠》一诗中,就使用了孔子因赵简子谋害窦犇而驱车返回的典故:

孔子回车处, 驱车尔却来。
古祠为今用, 造像尚崔嵬。
烈石寒泉活, 危崖峭壁裁。
澄清汾水日, 一镜映中开。

与传说中不同,史实中对此的描述颇具争议。赵简子对于窦犇的加害,不排除存在窦犇、舜华二人背叛赵简子,或赵简子意图兼并窦犇的可能性。在范、中行氏之乱中,作为主要进攻一方的赵氏在围困朝歌时,由于范氏对城池的长期经营,朝歌城坚粮足。加之范氏与晋国以外的势力交往密切,此时久攻不下的赵国自身也陷入了一定的危机当中。

安史之乱中的“定海神针”

李文畅

安史之乱一般被视为唐朝国运的转折点,虽然在战争爆发初期,唐廷暂时丢失了长安和洛阳等大城市,但最终巩固了摇摇欲坠的政权。安史之乱爆发初期,地方官员的抵抗和努力,为唐军集中力量反攻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在这其中,太原府(下简称太原)军民也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段历史的细节,可以从《旧唐书》中得以一窥。

安禄山反叛蓄谋已久,在战争初期就迅速攻占了河北大量州县,而后更是兵进东都洛阳,对唐廷的政治中心构成了直接威胁。但是,对于安禄山集团来说,他的侧翼仍然存在危机,因为以太原为中心的唐军守备部队随时可以东出并陲,拦腰斩断河南战场的叛军与其河朔老巢的联系。也就是说,只要太原仍然在唐廷手中,安禄山集团的归路就有被随时切断的危险。因此,安禄山在兵临潼关的同时,又另外调拨人马分别从大同、河北等处向太原进逼。

安禄山对太原的第一波攻势很快被粉碎,因为唐廷意识到了保卫北都太原对于盘活整个战局的重要性。长安朝廷调名将郭子仪率领精兵赴山西战场解围,先斩杀叛将周万顷,又击败安禄山麾下的大同军使高秀岩,扫清了太原城外圈的敌兵。而原先假意归降安禄山的河北常山太守颜杲卿也迅速反正,举起唐朝大旗,与郭子仪的反攻相呼应。颜杲卿捕获敌将高邈与何千年后,经太原送往关中报捷,给被叛乱搅得焦头烂额的唐玄宗打气。虽然太原尹王承业把颜杲卿的功劳揽为己有,颜杲卿与其族人也在日后抵抗叛军反扑的过程中壮烈殉国,但太原毕竟牢牢掌握在唐廷手中。随着安禄山攻打潼关受挫,郭子仪和李光弼等唐将依托太原为基地,率军出太行山隘口攻入河北境内。《旧唐书·郭子仪传》中记载,此路唐军如入无人之境,“拔常山郡,破贼于九门,南攻赵郡,生擒贼四十人,皆舍之,斩伪太守郭献璆,获兵仗数万”。太原的唐军就像一把尖刀,抵在了叛军的后背上。

安禄山攻打潼关不克,自然寄望于史思明等手下能够为其巩固后方,结果史思明等人在河北战场被郭子仪的疑兵之计弄得精疲力竭,最后在嘉山决战中遭遇重创。《旧唐书·郭子仪传》称唐军此役“斩贼四万级,生擒五千人”,即杀伤敌人总计四万五千人。这个数字可能存在水分,但安史叛军在河北战场不再掌握主导权却是不争的事实。据《资治通鉴》记载,郭子仪与李光弼在嘉山大捷后便遣上奏朝廷强调,面对叛军挑衅时,“潼关大军,惟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前线的唐军将领对形势看得很清楚,安禄山的叛军表面上进展神速,实则面临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如果不是唐玄宗与杨国忠君臣逼迫潼关守将哥舒翰主动出击,导致关中地区被安禄山叛军乘虚夺取,河北与关中地区的唐军对安禄山集团形成前后夹击形势,恐怕只是时间问题。那样的话,安史叛乱或许不会持续八年之久。

然而,潼关和长安毕竟陷落了,唐玄宗一行

人奔往四川,郭子仪等人被迫退回太行山以西,而河北的叛军力量得知关中打开了局面,重新集结兵力,四路进兵,打算一举攻克太原,彻底消除太原地区唐军对其补给线的威胁。

此时的太原战备松弛,唐廷也抽不出更多兵力增援,“时锐兵皆赴朔方,而麾下卒不满万”。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临危受命,肩负起保卫太原城的职责。李光弼到任后,迅速处决了不愿交出兵权的侍御史崔众,对其他官员形成有力震慑。紧接着,李光弼指挥太原军民投入紧张的战中。李光弼军事经验丰富,他认为加固城墙只会白费工夫,“城环四十里,贼至治之,徒疲吾人”(《旧唐书·李光弼传》),转而命人到城外挖掘壕沟、构筑土墙,形成多层防御圈。为了尽可能杀伤敌军,李光弼还拆毁民房,制造了需两百人才能拉动的投石车。李光弼还将自己的卧榻转移到城内东南角的帐篷中,彰显与前线将士共患难的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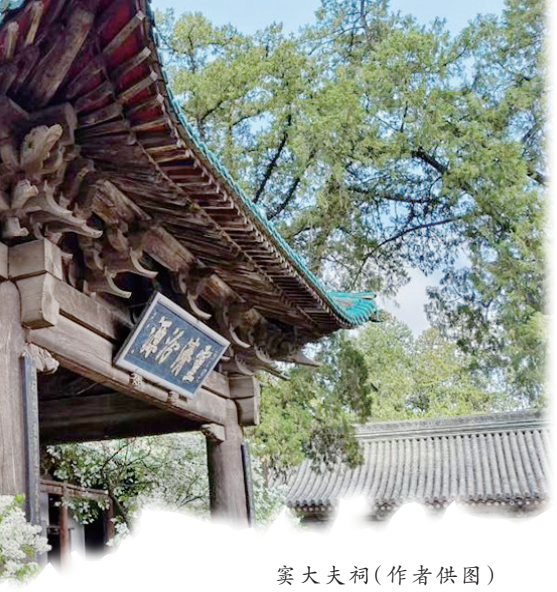
李光弼的这些布置很快发挥了效果,城外的壕沟与土墙暂时减缓了敌军攻城的速度,使李光弼有时间判断敌人的主攻方向,从而合理分配守城兵力。太原唐军使用的“撞石车”也给予叛军不小的杀伤。据《旧唐书·李光弼传》所载,每当“撞石车”发射出的巨石从天而降,“石所及辄数十人死,贼伤十分之二”。

叛军将领史思明在太原城下碰得头破血流,于是又采用攻心计,派人到城下搭台唱戏,讽刺唐朝皇帝无能。李光弼却趁着敌军松懈,派人挖掘地道通到城外,然后将唱戏的人俘获处死,给予叛军极大震撼。

史思明从太原围城中讨不到便宜,只能暂停攻势,而李光弼则不给对方喘息机会,他一边派人到敌军营地周围布置陷阱,一边派人去假装投降,引蛇出洞。叛军果然中计,出营后损兵折将,而李光弼则趁机派出手下轻骑兵追杀残敌。史思明本还想继续进攻,结果得到安禄山被暗杀、继任者安庆绪命令其回防老巢的消息,于是他只得将攻城的指挥权交给另一名副将蔡希德。可是蔡希德也没能扩大战果,而是接连被李光弼派出的敢死队偷袭。叛军长期围困太原无果,士气低落,而李光弼一方的守城力量却因为收编清夷、横野等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太原的城防更稳固了。

安禄山死后,叛军集团内部已经出现了分裂,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弑父自立,难以服众,史思明虽然在军中威望颇高,但其连续被李光弼指挥的唐军击败,反唐意志也出现动摇,这为其日后归降埋下伏笔。此后,唐廷与安史集团的主要拉锯战场逐渐由山西转向河南,太原城终归于安定。到了安史之乱后期,太原已经不再属于前线战区,而是成为唐军出发收复河北失地的后勤基地。太原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郭子仪与李光弼依托太原城组织的机动防御,为唐廷反败为胜、最终平定安史之乱奠定了基础,充分显示了太原“国之根本”的意义。



窦大夫祠 (作者供图)

除此之外,窦犇的封地相传位于古狼孟邑(今太原阳曲县一带),而赵简子的封地则位于晋阳邑(今太原市晋源区古城营村一带)。此时的赵简子虽为“六卿”之一,却也远未能够在与其他世家大族的争夺中能够稳操胜券。“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赵简子对于窦犇的势力兼并,或许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而无论是哪种原因,这位在传说当中具有美好品质与坦荡胸怀的贤明的窦大夫,成为了后世历代人们所赞赏与传颂的对象。而其与烈石寒泉间特殊的联系,以及在后世官员与百姓的共同推崇下,窦犇完成了从一个凡人到祈雨之神的转变。

“山西地瘠山多,风高天冷,十年中旱常八九。”清道光《阳曲县志》对山西地理气候的记述,让带有神话色彩的相关风物传说多出了几分可信之处。较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与不断增加的人口与耕地,使得当地民众因为旱灾的出现而头疼不已。对于因烈石山(今二龙山)阻隔而难以调运粮食的当地人来说,当地水资源的多少,将直接关系到庄稼的收成如何。作为治水长官的窦犇自然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爱戴。“生而英,灵死而济物”,也许宋大观元年(1107),宋徽宗对窦犇“英济侯”的追封,也来源于对水资源的需要。

在窦大夫祠正殿的两侧,存有历代遗留的石碑。刻于金大定二年(1162)的《英济侯感应记》原碑已不存,但碑记的内容却在《阳曲县志》中保留了下来。根据碑记可以得知,宋金甚至更早时,窦大夫祠就已经成为当地官员以及百姓求雨的场所。

“国保”背后的故事

(2)

感动东坡的太原葡萄

董金梅

冷官门户日萧条, 亲旧音书半寂寥。 惟有太原张县令, 年年专遣送蒲桃。 ——苏轼 《谢张太原送蒲桃》

这是苏轼在贬职流放期间,接到在太原作县令的朋友托人送来的葡萄时,写的一首诗,其最有可能的写作地点是黄州。黄州位于湖北,是苏轼三次贬谪地中距山西较近的地方,葡萄送到时不至于完全坏掉。

苏轼一生多次被贬职流放,深谙世态炎凉。特别是“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朋友因为怕被牵连而断绝了书信和来往。而太原的张县令,仍然能年年专门派人送葡萄,其中的情谊,深深感动了落魄中的苏东坡。整首诗词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了苏轼对县令的感激之情,并通过描绘冷清的背景和张县令送来葡萄的情景,展现了作者对亲人的思念和对友情的珍视。平实语言中蕴含着真挚的情感。

葡萄在我国古代曾叫“蒲陶”“蒲萄”“蒲桃”“葡桃”等。《史记·大宛列传》:西汉建元三年(前138),张骞出使西域,随后,“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可知,自西汉始,中国民间开始种植葡萄并引进西域葡萄酒酿造技术。《三国志》中“孟佗又以蒲桃酒一斛遗让,即拜凉州刺史”,孟佗用一斛葡萄酒就换得凉州刺史之职。直到南北朝,葡萄仍为难得之物,有人向北齐皇帝敬献一盘葡萄,居然得到一百匹丝绸重赏。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葡萄酒酿造史上最辉煌的一段时期,唐太宗从高昌国获得葡萄种和葡萄酒酿造法后,不仅在皇宫御苑里种植葡萄,还亲自参与葡萄酒的酿造。唐代许多诗人都对葡萄和葡萄酒大加赞赏,王翰的《凉州词》中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李白也云“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醱醋”,刘禹锡诗赞葡萄曰“自言我晋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此外,王维、杜甫、白居易等都有葡萄的吟咏佳句。可见葡萄的种植和酿酒技术在当时得到广泛的推广和运用。

太原一直是葡萄栽种的重要产区,由于气候干燥,所产的葡萄特别甘甜。北宋时期有记载说:“并州苦寒,饮食俭陋。惟酒极醇熟,果实葡萄之美,冠于四方。”苏东坡的这首诗也再次印证了太原地区种植葡萄历史之悠久与驰名。

扫码看视频

诗意图景太原 (36)